

## 个人专著《集体有意识与集体无意识》后记

厉震林

《集体有意识与集体无意识》 中国戏剧出版社 2008 年 2 月

—

本书是我的一本论文集。

自从 1990 年改行攻读文学硕士以来，迄今已经十七年了。当年从山东大学经济学系卸任四年教职，到北京师新成为了学生，至今记忆清晰。那是一个黄昏，我从济南登上了赴京的列车，行驶在华北平原的千里沃野之中，一的落日，悬挂在地平线上，似乎在向我们报以最后的祝福。我和师弟王宜文坐在窗口，呆呆地望着，似乎自己的心入了那一片火红之中。整个晚上，我们彻夜无眠，陶醉着秋日晚风一直坐到了北京。

对我来说，在从事了八年经济工作以后，终于可以学习心爱的艺术，内心的兴奋不言而喻。

因此，那个黄昏，深深地铭刻在我的情感记忆中，成为我生命的“形式造型”。

当年，黄会林教授招收了三个硕士研究生，其中，两个是济南的考生，我是山东大学教师，王宜文是山东建业学院教师，还有一位师妹是北京师范大学的应届毕业生。

从北京师范大学获得硕士学位以后，我来到了上海戏剧学院任教。阔别江南多年以后，我又回到了故乡浙江宁波市工作，心里确实感慨颇深。

十七年里，原来学经济的同学，已经一个个当上了司长、市长、大学校长，我自己虽然也担任过短期的文化广电管理局局长，但是，基本的社会身份还是一个大学教师，我却始终是无怨无悔。

我热爱艺术，它无涉代价。

这些年里，我也写了一些东西，除了创作剧本以外，出了几本个人著作，在国内外公开出版的学术刊物发表的算起来也有一百多篇，大约一百二十万字。

我是一个比较随性的人，研究的范围也比较广泛，基本上属于兴趣所至，有感而发。开始，人们对我比较熟悉影研究方面，发表的一些关于吴贻弓导演美学研究以及中国第五代电影导演研究的论文大多有些影响，多篇也被中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全文转载了。由于长期在上海戏剧学院工作，观看话剧机会较多，自己也有较大兴趣，因此，又几十篇关于中国实验话剧研究的论文，以至我参加全国学术会议时，人家介绍我经常有称我是从事实验话剧研究的，跟随余秋雨教授攻读博士学位，专业是戏剧文化学，与余老师商量以后，又选择了中国戏曲演员文化研究。

也许跟恩师余秋雨教授一样，我自己从事的是文化研究，主要以文化人类学作为自己的研究方法，选择自己比趣的文化现象进行研究，十几年间，已经涉及了电影、话剧和戏曲等领域。

曾经有人询问过郭沫若：您是历史学家、考古学家还是文学家、戏剧家、诗人？

郭沫若答曰：我是四海为家、无家可归啊！

其实，我自己虽然涉及了电影、话剧和戏曲等领域，它的纵向却是一直集中在演员文化和实验艺术两个方面。自己对这两个问题特别敏感，在潜意识里已经规整好了自己的研究兴趣，它一直触动着我学术神经的兴奋点和创造力。我相信这种直觉。

余秋雨教授在《艺术创造工程》一书中写道：

“不管哪一种文艺演出的评奖活动，最合乎情理的做法应该首先是精心选择一批有可靠的艺术感受力的评奖委员，然后在看完演出的当时，就让他们各自打下‘直觉分’。这些‘直觉分’的平均数，就是一种相当公平的裁决。有这种即时打分法太草率，喜欢在演出后反复组织评奖委员讨论，甚至请来创作人员座谈，多方征求意见，最后以平均数决定名次。这种做法看似细致、周到，实际上却常常导致最大的不公允，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割碎了、疏浚了珍贵的直觉。”

“评奖委员们的即时直觉，实际上已经包含着他们的全部理论素养和理性把握能力，这种理性能力既然已经可感化为一体，那就证明它已经完成了一种升华，与艺术家的生命合而为一了。比之于艺术家只能勉强运用的理论，就丰富得多了。”

“这是一种生命与生命之间的搜寻，这是‘黑箱’与‘黑箱’之间的呼唤，一旦撞击，则从心理到生理全盘轰击。这便是最深刻的直觉把握。获得了这种把握，什么分析也不再存在。”

“直觉，最完整、最经济地体现了一个人此时此刻的总体审美水平。”

此语写于二十年以前，现在的评奖大多已经采取这种方法，但是，这种对于直觉的精辟论述，仍然令人怦然心动。

是的，直觉是“一种生命与生命之间的搜寻”，“‘黑箱’与‘黑箱’之间的呼唤”。我自己对于演员文化和实验艺术的研究，虽然谈不上“从心理到生理全盘轰鸣”，但是，确实也可以说是“合而为一”。

人们常说，从事艺术创作需要灵气，其实，从事艺术理论研究同样需要灵气，甚至一点也不会比艺术创作要求更高。我希望自己的学术研究能够拥有一点灵气，写一些自己真诚而又独特的思想，写一些前人未曾涉及的认识，写一些有涉及却能够不同的见解，写一些人家隐约有些感觉却又无法言说的思维，写一些别人根本不曾思考的看法，流动着思想和思辩的闪烁火花，涌动着哲学和人格的内在张力，在文字的大街小巷中，一路展露着思想的风景，是一次迷人的心灵和精神旅游。

这是我的理想，我的心向往之。

我会按照直觉，将演员文化和实验艺术研究下去。

只是，我的研究领域将会集中在一个具体领域。我毕竟不是郭沫若，人家是一个天才，在每一个领域都可以游刃有余，制高点，成为一个神话，而我只是一个凡人，一辈子也许只能做一件事情。

其实，一辈子能够做好一件事情，已经不容易了。

这个时间不会太久，我随后还要出版四部个人著作，大约有一百八十万字，都已经在作最后的定稿。十几年的除了写了一些剧本，主要在从事这个工作了。完成这个工作以后，我将集中我的研究领域。

好在我在几个领域的广泛涉猎，以后集中一个研究领域，会使视角更加开阔一些，会有不同的学术性格和气质。这也是我所珍惜的。

本书的论文，也就是这种研究背景的产物。

最早的一篇论文《论〈原野〉的民族色彩》，还是在硕士研究生一年级的時候写的。当时，住在北京师范大学501室，还依稀记得深夜赶写的情景，窗外的学院南路偶尔传来汽车的鸣声，抬头望去，一颗颗高高的白桦树静静地，似乎在沉思着什么。论文发表在《北京师范大学研究生学刊1992·创刊号》，由于是创刊号，原北京师范大学梓坤院士在题词中写道：

“请特别珍惜您的第一篇论文，它是您学术生涯的起点，也许还是您一生科研工作中的一个高峰，对成功的学者回忆会终生鼓励着您。许多大学者都得力于早期的工作，您可以从科学史中找到例证并深受启发。”

这篇论文自然不是我发表的第一篇论文，但是，我却记住了这几句题词。确实，“早期的工作”可能是非常稀却是充满真诚和勇气的，具有着那个年龄阶段和那个时代岁月特有的气息，它是不可能复原的，也就显得特别珍贵。

《论夏淳导演艺术的主情性》一文，是因为当时夏淳先生正在给我们上课。为了写作这篇论文，我还去了夏淳里一趟。当时，他家在东城区史家胡同的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宿舍。后来才知道，文革时期曹禺先生曾在这里当过门他家是一幢六层楼公房，楼道堆满了什物，显得有些暗，心里确实觉得有点诧异，一个著名导演住在这样的房子里，也很简朴，墙壁上挂有与周恩来总理的合影和曹禺先生的题词。后来，在上海夏钢先生家里，我还曾经与他谈起他父亲家里的情景。现在，夏淳先生早已离开我们，回忆这篇写作时的情形，不禁唏嘘不已。

需要说明的是，本书的其中三篇论文是我和徐煜博士以及我的研究生朱卉、陈玲合作写作的。

我的恩师黄会林教授，是我艺术生涯的领路人。没有她，我真不知道自己现在会是怎么样？也许还在从事经济因为此前，我曾经报考过北京一所戏剧艺术院校的硕士研究生，初试考了第一名，而且是唯一一位上线的，后来竟然没有成功，原因是跨专业报考，从经济到艺术，跨得太大。因此，第二年报考时，我心里犹豫了，是否会重蹈覆辙？我就给黄老师写了一封信，说明了自己的情况以及担忧。黄老师给我回信，只要符合国家的分数线，她就会要我。当时，我的眼泪都快流了出来。

应该说，一个人跨专业报考，需要付出多大的勇气和代价。他是因为真正热爱才来报考的，而热爱，是事业成功的基础，因为热爱，他可以不计辛苦，因为热爱，他可以乐不思蜀。当时的经济专业，是一门显学，而艺术相对比较冷门。从热门的经济专业改行到已经逐渐地边缘化的艺术专业，正是出于一种真正的热爱啊！

我记得当时考上艺术专业以后，到我大学同班同学家里玩。他当时是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财务司的一位处长。现在是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房产管理司司长。他跟我说，你学了这个专业，以后怎么找工作啊？我只是莞尔一笑。它的原因同样非常简单，因为热爱。

我不能说当时这所戏剧艺术院校的老师缺乏眼光，但是，他们确实忽视了热爱在事业中的巨大原动力和冲击力。从北京师范大学毕业以后，我仍然和黄老师保持了较为密切的联系，一直受到她的教诲和鼓励。有一年黄老师过年，千里迢迢从北京还给我母亲带来了一双保暖鞋，至今让我和母亲备感温暖。

目前，黄老师仍然担任北京师范大学这所中国第一流的著名高等学府的艺术与传媒学院院长。像她这样年纪，任如此重担，恐怕在全国也是罕见的吧？现在，她又在百忙之中拨冗给我写序，我只能说大恩不言谢。

恩师余秋雨教授，自然是对我影响最大的一位老师。虽然由于余老师经常外出进行文化考察，不时常在上海，常接触，但是，这种影响却是灵魂性的。每次读余老师的文章，我总是如同前面所说的精神旅游，处处美景，处处人生一大美事。

余老师的文章，无疑是灵气的一种典范作品。

我时常说，我能得余老师一零头，吾生足矣。

看来，还得努力。

这里，我还要感谢复旦大学合作导师周斌教授、中国艺术研究院合作导师刘祯教授，他们和黄会林教授、余秋雨一样，一直对我关爱备至。他们的恩情，我将在以后出版的个人著作中再加表达。

我的母亲王大娜女士，今年已经七十七岁，曾经长期住在上海，照顾我的生活。母亲一生为人善良，吃苦耐劳，如山，对我来说，是母恩比天还大的。祝愿母亲健康长寿。

我的夫人沈熙女士，大学毕业以后就在上海外滩一家美国金融机构工作，经常加班加点，但仍然将我的生活安排得井有条，使我能够舒心投入工作。我的岳父沈德康教授，与我是复旦大学校友，1963年毕业于复旦大学物理二系，长期在北京国防科工委系统工作，我的岳母徐玲玲女士，在我母亲回到浙江以后，一直照顾我的生活，使我感受生活。

最后，还要感谢所有关爱我的老师、亲属、朋友，没有您们，就不会有我的今天。这里，我虽然没有一一写出名字，但是，在我的心里却是大写着您们的美名。

2007年6月9日上海华升

所

原载《集体有意识与集体无意识》 中国戏剧出版社 2008 年 2 月

厦门大学图书馆